

#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否显著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度？\*

张军<sup>1</sup>，段喆<sup>1</sup>，闫东升<sup>2</sup>

(1.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2.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 210093)

**摘要：**基于沿海32个大中城市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定量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对外开放的影响。研究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于对外开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的分类对比研究发现，第一批、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提升效果不够突出，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效应发挥具有一定滞后性，即成立时间越久、效应越明显。本文研究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效应的评估提供了方法，也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度；双重差分；城市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912(2020)07-0072-09

## 一、引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代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举措。自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起，我国已在全国布局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初步架构起了横跨东西、纵联南北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功能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目的是加速我国更好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构建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新的内生动力<sup>[1]</sup>。从演化进程来看，我国在立足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正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容与差异化制度探索，逐步解决开放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批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促进开放发展的制度创新成果孕育而生，对外开放的内涵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从内在本质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试验田，是对现行制度安排展开边际性改良，重点在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加速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形成适应时代需要、风险可控的制度体系，以持续放大增强对外开放的带动效应。相反，在当前单边主义突出、贸易摩

擦日渐增多的时代，只有保持战略定力，以更高的开放姿态迎接发展道路上的各种挑战，才能实现更好地发展。而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要构建与国际经贸规则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先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全面开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体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求我们在构建全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要有新的内容和内涵，要有新的改革举措，其根本目的是要用开放倒逼改革，要通过改革来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加速贸易、金融、投资、人才、科创等领域的要素集聚。而反过来，全面开放的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不确定的风险，需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压力测试，进而确保全面开放的进程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全面开放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互动之间的量化关系是怎样的，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全面开放的溢出贡献度有多大，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客观衡量评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当前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大

作者简介：张军（1982-），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区域协调发展；段喆（1983-），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闫东升（1990-），男，河南周口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规划。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低碳绿色发展的‘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研究”（19AJY001），项目负责人：冯宗宪。

多集中在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及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具体改革事项之中，且以定性研究居多，鲜有学者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城市对外开放度关系的深层次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客观评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成效。为了更好地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全面开放的促进作用，本文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要求，以我国沿海地区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充分阐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全面开放的互动关系，利用沿海大中城市 2006 - 2017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全面衡量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对于全面开放的促进作用，并结合当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现状，就更好的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全面开放互动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通过不同类型的对外开放行为与模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凭借集聚全球要素等比较优势获得了发展机遇，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各类特殊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以及新增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城市群等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载体，其行为是通过特定区域，展开制度创新、结构变革和技术等要素集聚，进而发挥乘数效应，成为经济新的增长极<sup>[2-6]</sup>。同时，相关研究发现，正是由于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要素投入、固定资产投资、FDI、人力资本、财政状况、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等作用更加突出，并集中表现在各类区域空间增长极上<sup>[7-9]</sup>。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向高质量阶段转变，对对外开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接轨，进一步完善投资自由、贸易便利化政策，为全球要素资源在我国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采取务实的态度，先在某个特定区域开展压力测试和制度创新，评估其效果和风险。如果试验效果好就扩大试点范围，乃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sup>[10]</sup>，以便更好的探索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集聚更具比较优势的要素资源，加速构建开放型发展新格局，形成新的全面开放增长极<sup>[11-12]</sup>。

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可以通过制度效应、中介效应、出口平台效应和贸易引致效应，加速投资贸易自由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提升对外开放的深

度和质量<sup>[13]</sup>。通过 6 年多的建设，我国已形成了 18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可以说，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倒逼了改革的推进，推动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又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安排，加速行政职能转变，金融创新开放，投资贸易自由化等，实现要素配置国际化自由流动，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从各地实践效果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确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质量。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谭娜等认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有效促进了上海的对外开放，尤其是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上海每月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73%<sup>[14]</sup>；项后军等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进出口贸易和投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进口货物贸易和对外投资尤为显著，这也就说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提高了对外开放度<sup>[15]</sup>；殷华等（2017）发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上海市 GDP、投资、进口和出口的增长，加速了上海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sup>[16]</sup>；苏振东（2016）发现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除了促进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外，还带动了北京、河北等地的贸易额，间接印证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着正向促进关系<sup>[17]</sup>。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

### （一）研究方法

新常态下要保持我国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所能依靠的主要路径是全面开放与深化改革，通过不断的形成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促进全球要素资源的集聚、技术的持续革新、投资贸易金融等自由化，进一步释放我国发展的空间与潜能。为了更加清晰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对外开放的互动关系，本文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视为一种“准自然试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来测度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对外开放的互动关系。实际上，DID 是当前常用的分析政策效果的主流评价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某项政策视为一次外生的“自然试验”，通过试验组和控制组的效应分析来判断某项政策的净影响程度。许多学者通过这一方法对各类政策试验展开了测度。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来看，秦放鸣等<sup>[18]</sup>、吕越等<sup>[19]</sup>、宋丽颖等<sup>[20]</sup>、张军等<sup>[21]</sup>、<sup>[22]</sup>、孙林等<sup>[23]</sup>、刘张立等<sup>[24]</sup>、刘晓欣等<sup>[25]</sup>分别利用双重差分对金融、税费改革、自由贸易试验

区、高铁、国家高新区等诸多领域展开研究。从学者的研究脉络来看，双重差分之所以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果评价，主要是因为其通过对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差异比较，发挥解释变量的外生性特点，避免了内生性问题的出现，确保了政策效应评估的无偏估计，能够有效反映政策实施的净效果。

### (二)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精准测度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试点政策对于对外开放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将样本城市分为实验组（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城市）和控制组（没有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通过 DID 方法分别度量实验组和控制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前后的对外开放度的变化增量，再度量这两组变化增量的差值来确定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净效果。

本文构建的基准模型如下：

$$OI_{it} = \beta_0 + \beta_1 F_{it} + \beta_2 T_{it} + \beta_3 treated + \beta_4 V_{it} + \alph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模型中的  $OI_{it}$  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用来表示对外开放度（水平）， $F_{it}$  为虚拟变量，主要表示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这一政策变量， $V$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alpha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lambda_t$  表示时间的固定效应， $\varepsilon$  为随机干扰项， $i$  与  $t$  分别表示第  $i$  个城市与第  $t$  年， $treated$  作为交互项，主要是用来反映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程度，其前面的系数  $\beta_3$  代表了净效果的大小。一般的说，如果系数的值显著为正，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反之相反。

### (三) 研究样本

当前，国家共设立了 18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多个城市，从空间地理上看，东、中、西部均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实行了沿海地区的开放，从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上看，沿海地区本身开放程度就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也是为了以改革促开放。为了有效测量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

外开放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沿海 32 个大中城市为样本，以 2017 年设立之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将上海、天津、广州、珠海、深圳、厦门、福州、平潭、沈阳、大连、营口、舟山 12 个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组，其余 20 个沿海开放城市构成了控制组样本。

### (四) 变量选取

为保证双重差分模型呈现出较好的稳健性，本文在选取变量时，充分考虑到对外开放的影响因素后，选取适合的变量，便于精准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的影响。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影响程度，首先必须确定对外开放的衡量指标。按照伍凤兰等<sup>[26]</sup>、易行健等<sup>[27]</sup>、吕诚伦等<sup>[28]</sup>、谢锐等<sup>[29]</sup>、王德祥等<sup>[30]</sup>学者的研究，对外开放度直接反应在进出口贸易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上，主要衡量指标有外贸依存度 WMI 和外资依存度 WZI。因此，本文使用外贸依存度（人民币表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和外资依存度（人民币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 GDP 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按照双重差分原理，本文引入  $F_{it}$  和  $T_{st}$  解释变量，如果样本城市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则  $F_{it} = 1$ ，反之  $F_{it} = 0$ 。 $T_{st}$  为时间虚拟变量，主要是度量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时间节点，如果设立之前或者未设立，则取值为 0，设立之后则取值为 1。

3. 控制变量。为了客观评判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净效果，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引入控制变量，以剔除其他各类影响对对外开放度的因素。在控制变量指标选择上，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质量、政府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财政支出补偿系数、居民教育水平及储蓄率指标。

按照上述，本文计量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计量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WZI	外资依存度	人民币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 GDP 的比值
	WMI	外贸依存度	人民币表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
解释变量	$F_{it}$	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	虚拟变量，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取 1，未设立取 0
	$T_{st}$	时间虚拟变量	设立之前或未设立， $T_{st} = 0$ ；设立之后 $T_{st} = 1$

控制变量	gov	政府发展水平	政府财政收入与 GDP 的比值
	lngdp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 GDP 值取对数
	lnagdp	经济发展质量	地区人均 GDP 值取对数
	fin	财政支出补偿系数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
	edu	受教育水平	当期高校在校人数与年末常住总人数的比值
	Sav	储蓄率	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
	Inv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减 1

(五)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06 年 - 2017 年的 32 个沿海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需要强调的是, 为了确保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本文选择 2006 年为基年, 变量的名义值通过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 人

民币与美元的转换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汇率值。

(六) 描述性统计

在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 对所涉及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 具体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in	Max	Mean	Std. Dev.
WMI	0.0062	3.2153	0.5694	0.5711
WZI	0.0508	24.8414	3.4040	2.7202
gov	1.0054	58.5101	10.5007	5.2147
fin	28.5300	495.4953	84.776	36.5548
inv	-70.4179	72.7424	4.3987	12.5467
edu	0.1937	10.3904	3.1203	2.3860
sav	16.5638	558.6586	179.9242	87.3692
lngdp	4.6159	10.5629	7.5346	1.0075
lnagdp	9.3293	12.9484	10.2922	0.4559
$F_{it}$	0	1	0.2187	0.4139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对外开放的总体效应分析

表 3 报告了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对外开放的影响程度。其中, 第 1 列、第 2 列是在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程度, 第 3 列、第 4 列是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影响程

度。从结果来看, 交互项 treated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均为正值, 且显著。具体而言, 在剔除其他可能影响对外开放度的因素外,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的系数估计值分别是 1.216 和 1.937, 均高于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的系数, 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确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度的提升。

表 3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于对外开放的总体影响

VARIABLES	WMI	WZI	WMI	WZI
	1	2	3	4
treated	1.202*** (12.52)	1.992*** (3.16)	1.216*** (10.70)	1.937*** (2.61)
lngdp			-0.383*** (-3.15)	-0.943 (-1.37)

fin			0.001** (2.10)	-0.008 (-1.46)
gov			-0.011*** (-3.37)	0.094 (1.48)
sav			-0.000 (-0.34)	-0.009 (-1.32)
edu			-0.009 (-0.31)	-0.074 (-0.28)
inv			-0.001 (-0.81)	0.028** (2.19)
R-squared	0.340	0.382	0.421	0.339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obust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二) 不同批次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的效应分析

前文的结果是从整体上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净效应，但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别在2013年、2015年、2017年分三批设立的，其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动态效果。为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不同批次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我们按照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批设立的时间节点，分别度量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其中第一批为上海、第二批为天津、广州、深圳、珠海、福州、厦门、平潭，第三批为大连、沈阳、营口、舟山等。表4第1列、第2列呈现了第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第3列、第4列呈现了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

放度的影响，第5列、第6列呈现了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影响。

从结果上看，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批设立，外资依存度的系数先升后降，外贸依存度一直下降，说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第二批的推进效果较为明显，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和对于促进进出口额的作用要高于第三批。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第一、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制度创新突破的力度较大、亮点多，其带动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而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时间不足1年，其带动效应仍未完全释放，说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产生的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也就是说，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时间越久，其带动效应越强。

表4 三批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影响结果

VARIABLES	WMI	WZI	WMI	WZI	WMI	WZI
	1	2	3	4	5	6
treated	1.543*** (14.07)	1.823* (1.84)	0.067** (1.97)	8.382* (1.73)	0.044** (2.38)	3.829*** (4.18)
lngdp	-2.462*** (-2.89)	-8.253 (-1.20)	-1.616*** (-3.43)	-7.706** (-2.51)	-2.065*** (-2.86)	-14.494*** (-2.64)
lnagdp	2.140*** (2.59)	7.032 (0.99)	1.236*** (2.84)	7.201** (2.36)	1.683** (2.42)	14.650*** (2.58)
fin	0.001*** (2.93)	-0.004 (-0.73)	0.001*** (3.36)	-0.005 (-0.94)	0.001** (2.19)	-0.004 (-0.83)

edu	0.001 (0.06)	-0.103 (-0.42)	-0.001 (-0.06)	-0.199 (-0.80)	0.005 (0.20)	-0.190 (-0.83)
sav	-0.001 (-1.10)	-0.004 (-0.39)	-0.001 (-1.11)	-0.003 (-0.40)	-0.001 (-1.30)	-0.000 (-0.04)
inv	-0.001 (-0.49)	0.013 (1.26)	-0.001 (-0.56)	0.011 (1.07)	-0.000 (-0.29)	0.024** (2.20)
gov	-0.004 (-1.51)	0.036 (0.80)	-0.012 (-1.36)	0.219*** (2.70)	-0.016 (-1.54)	0.321*** (2.77)
R-squared	0.619	0.354	0.493	0.380	0.469	0.475

Robust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三) 反事实检验

为有效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前人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更改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时间来进行反事实验证。反事实验证的核心是为了排除其他促进对外开放度的因素，如果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时间提前1-2年的前提下，交互项 *treated* 始终显著为正，这说明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不是单一的来源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而有可能来源于其他因素或者随机性因素。反之，如果交互项始终不显著为正或者为负，这就说明了对外开放的提升的确是由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设立而推动的。

表5展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前设立1年和2年时的情况，其中第1列、第2列是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前提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前设立1年的反事实检验结果，第3列、第4列是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前提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前设立2年的反事实检验结果。从交互项 *treated* 的系数来看，均不显著为正，这说明了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不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加速了对外开放度的提升。

表5 反事实检验（假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前设立1年和2年）

VARIABLES	WMI	WZI	WMI	WZI
	1	2	3	4
<i>treated</i>	0.015 (0.33)	-0.306 (-0.51)	0.020 (0.44)	-1.028 (-1.09)
ln <i>gdp</i>	-1.832*** (-3.51)	-6.555** (-2.14)	-1.847*** (-3.45)	-5.483 (-1.64)
ln <i>agdp</i>	1.517*** (3.00)	5.856* (1.85)	1.533*** (2.95)	4.673 (1.36)
<i>fin</i>	0.001*** (2.70)	-0.007 (-1.31)	0.001*** (2.71)	-0.007 (-1.31)
edu	-0.022 (-0.84)	-0.127 (-0.47)	-0.022 (-0.85)	-0.121 (-0.44)
sav	0.000 (0.01)	-0.007 (-0.96)	0.000 (0.02)	-0.007 (-1.01)
inv	-0.000 (-0.23)	0.031*** (2.81)	-0.000 (-0.20)	0.027*** (2.89)
gov	-0.010*** (-3.72)	0.094 (1.45)	-0.010*** (-3.62)	0.084 (1.32)

R - squared	0. 502	0. 355	0. 502	0. 360
-------------	--------	--------	--------	--------

Robust t -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 01 , \*\* p < 0. 05 , \* p < 0. 1

#### (四) 进一步分析

通过前文研究,我们得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且其对对外开放度的带动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越早,其带动效应越显著。更进一步的讲,从对外开放度的两个重要维度来讲,在外资依存度方面,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立足于对外开放的制高点,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而这正是国际市场关注中国深度开放的着力点。正是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幅放宽了市场准入、构建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得更多优质外资持续投入,进而各类要素能够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实现最大程度的流动,刺激了 FDI 的持续增长,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急需的资本,弥补了国内部分资本不足的问题,而且集聚了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人才等要素,使得外资依存度对对外开放产生更大的拉动作用。而从外贸依存度来讲,通过一系列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特别是共用一张负面清单及部分关税的降低,降低外商投资性准入条件等,持续释放了制度创新的红利,吸引更多投资和贸易者来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兴业发展,提升了贸易往来的便利性,降低了制度性成本,促进了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这些都为主动扩大开放、调节贸易结构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了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匹配的改革措施,使得资源配置的空间不断扩大,与国际经贸往来持续增加,进而促进了进出口额快速增长,并促使中国向更高级别的对外开放迈进。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直接促进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的提高,进一步加深了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

###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国家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新形势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我国的开放发展赢得主动、积累优势、创造空间,具有重大意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在持续开展制度创新,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发展诉求中逐渐诞生的,它是我国构建“双轮架构”开放型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是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

尝试。因此,精准测度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效果,对更好的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自主改革权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文章运用 32 个沿海大中城市 2006 年 - 2017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对外开放的影响进行了衡量,研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对外开放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从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来看,第一批、第二批对对外开放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说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力度较大,制度创新的亮点多,其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而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对外开放度的提升效果不够突出,主要是由于效应滞后所致。可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时间越早,其带动效应越突出。

#### (二) 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通过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全面开放,也有利于实现各类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进而以放、管、服为横轴,以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的改革为纵轴,构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新坐标系。为了更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效应,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在以下几方面改进:

第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突出特色,开放发展。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有 18 个之多。研究结论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能够有效促进对外开放的提升。因此,为了更加突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引领作用,各地在建设要立足中央批复的方案,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要素特征,突出特色,强化融合与开放发展,杜绝“一窝蜂”发展模式;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分阶段、分步骤的推进实施,摒弃以往类似于开发区的发展模式,要始终围绕开放新格局中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定位,通过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不断的强化制度创新,丰富压力测试的内容,为全面改革开放探路支招。

第二,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强化顶层设计。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足,协同推进难;充分授权不足,实践创新难;压力测试不足,开放广度拓展难;进度标准不足,任务期限判定难。通过对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调研发现,

当前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在表层的改革上做足了文章,但是对深层次的改革还是很难推进,整体上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都面临深层次改革推进难度大的窘境。在完成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资管理模式使命的基础上,如何更加深入的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深化改革有效融合,实现更大的作用,这是顶层设计中必须慎重考虑的。因此,要从改革的角度,设计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当前改革的衔接,处理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固有模式革新的关系,处理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与推进难度大的关系,并以壮士断腕的雄心破除现有发展中的各种人为障碍和利益,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更加具有深度、力度。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改革自主权。事实上,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最终是要回归到自由贸易本身,回归到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要素自由化的本质上。我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率先试行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匹配的政策,目的是实现商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外向型经济的内涵。那么,在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战略性与协同性,既不能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扩大化,盲目堆叠与其功能不匹配的试验任务,也不能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缩小化。在此基础上,各地应按照中央部署,主动争取承担国家更多的改革权,进而探索扩大改革的力度。同时,要强化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在省级层面充分授权,能在自贸试验区试验的,优先试验,将“放、管、服”的最后一公里打通,进而形成更深层次的改革,为下一阶段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更好的发展基础。

#### 参考文献:

[1]刘秉镰,边杨.自贸区设立与区域协同开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1):90-101.

[2]厉以宁.改革开放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四十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和理论的发展[J].经济研究,2019(10):4-6.

[3]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5(6):44-54.

[4]柳天恩,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与展望[J].中国流通经济,2019(11):116-128.

[5]陈继勇,雷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

贸易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9):3-10,87.

[6]Schminke A. Using export performance to evaluate regio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3,149(2):343-367.

[7]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7):3-15.

[8]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经济研究,2013(9):17-29.

[9]石风光.中国省区经济增长源泉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线性和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财贸研究,2017(2):9-20,110.

[10]林毅夫.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倡议与举措[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13.

[11]洪银兴.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的政府作用[J].经济研究,2014(1):14-16.

[12]张幼文.7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与历史逻辑[J].世界经济研究,2019(7):3-12.

[13]扶涛,王方方.我国自贸区建设与对外经济开放三元边际扩展战略[J].经济问题探索,2015(12):121-127.

[14]谭娜,周先波,林建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下的反事实分析方法[J].国际贸易问题,2015(10):14-24,86.

[15]项后军,何康.自贸区的影响与资本流动——以上海为例的自然实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8):3-15.

[16]殷华,高维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产生了“制度红利”效应吗?——来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7,43(02):48-59.

[17]苏振东,尚瑜.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天津“出海口”效应研究——兼论天津自贸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16(10):108-118.

[18]秦放鸣,张宇,刘泽楠.高铁开通推动地区人力资本提升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J].上海经济研究,2019(11):70-83.

[19]吕越,陆毅,吴嵩博,王勇.“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

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J]. 经济研究 2019(9): 187-202.

[20]宋丽颖,郭敏. 自贸区政策对地方财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11):14-24.

[21]张军,闫东升,冯宗宪,李诚. 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动态分析[J]. 经济经纬 2019(4):71-77.

[22]张军,闫东升,冯宗宪,李诚. 自贸区设立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动态视角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11):125-133.

[23]孙林,胡玲菲,方巧云.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中国进口食品质量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5):54-68.

[24]刘张立,吴建南. 中央环保督察改善空气质量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9(2):23-42,193-194.

[25]刘晓欣,张辉,程远. 高铁开通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J]. 经济

问题探索 2018(8):28-38.

[26]伍凤兰,马忠新. “一带”与“一路”沿线18个省区市对外开放度的比较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17(1):6-10,185.

[27]易行健,左雅莉. 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与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国际经贸探索 2016(9):25-39.

[28]吕诚伦,王学凯.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研究——基于汇率变动、外贸依存度的视角[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9(3):113-118.

[29]谢锐,赵果梅. 基于贸易国内增加值视角的中国外贸依存度研究[J]. 国际商务 2014(5):82-91.

[30]王德祥,李建军.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1978~2007年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8):15-19,87.

(编辑校对:孙敏 吴洪敏)

### Ca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Trade Zone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Opening Degree of Cities?

Zhang Jun, Duan Zhe, Yan Dongs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2 large as well as medium-sized cities along the coast from 2006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a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trade zone on opening degre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e trade zon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opening degree.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the free trade zone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free trade zone are more obvious. However,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third batch of free trade zone are not outstanding enough. After analysis, this shows that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 in the free trade zone have a certain lag, that is, the longer the establishment, the more obvious the effec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 method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ree trade zone.

**Keywords:** Free Trade Zone; Opening degre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City